

长城的历史脉动与“北疆文化”的构建

◎赵现海

中国古代是拥有广阔疆域、多种族群、多元文化的王朝国家。空间性是认识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的重要视角。古代中国一方面由多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区域空间所构成，但另一方面各区域空间之间并非是静态分割而是动态流动的。以北方边疆为例，由长城设施所构建的社会秩序，便借助自身的脉动作用，推动了多元融通“北疆文化”的融合与塑造。

多元“北疆文化”的历史融合

对于历史而言，地理不仅是空间的舞台，而且扮演着能动角色，甚至从长时段而言，是历史的决定因素。亚欧大陆的南半侧，受到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农业普遍发达。与之相比，亚欧大陆的北半侧，也即欧亚内陆，暖湿气流受阻于越来越高的地势，很难到达，气候干冷，形成了草原、戈壁、沙漠的地貌形态，农业不发达，只能开展农业、牧业的混合经济，甚至完全的游牧经济。游牧政权建立后，与农业政权形成了长期的对峙态势。前者依托骑兵的军事优势，后者依托农业的经济优势，从而形成长期的平衡。这种平衡表面看来是一种军事平衡，深层来看是一种经济平衡，但究其根源是一种生态平衡。

为应对游牧政权，农业政权采取过多种办法，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方式。众多的方案之中，东西世界都曾经推行过长城方案，而中国尤其重视这一方案，长时期、大规模修筑长城。战国以来，汉民族与北方民族都不断加入到修筑长城的历史之中，推动长城成为中国解决亚欧大陆南北差异的主流方案之一。

长城边疆范围很广，南至太行山脉，北至漠南草原，甚至远及漠北草原。西汉武帝太初三年，派遣光禄徐自为从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出发，向北行进，修筑城障列亭，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直达卢沟河（今克鲁伦河）。与此同时，命令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守在徐自为军的两侧，从而形成了三道纵向防线。此外，又派遣强弩都尉路博德修筑居延塞。辽朝在呼伦贝儿草原，挖掘了一道漫长的界壕。金朝为防御蒙古的进攻，既修筑了边墙，又修建了城堡，还挖掘了界壕。金界壕外缘自额尔古纳河北岸经满洲里市北，直到蒙古国。

在中国历史上，长城对于南北中国都发挥着脉动作用，推动了南北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伴随长城的不断修筑，广袤的北方边疆，长期分布着大量军队与附属人口，一方面吸附了内地资源不断北上，另一方面推动了当地的农业垦殖。而地处蒙古高原的北方民族，由于游牧经济十分容易受到干旱、寒潮的袭击，从而不断南下，归附中原王朝，被安置于长城边疆的内外两侧。

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为躲避北匈奴敌对单于的军事追击，并解决部众的生存困难，前来汉朝朝觐。宣

帝在甘泉宫隆重接见，赏赐丰厚。呼韩邪单于向宣帝表达了为汉朝守卫长城的愿望。宣帝同意了呼韩邪的请求，派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统率一万六千骑兵，并征调长城地区数千将士，共同护送呼韩邪，驻扎于光禄塞（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朝阳镇小召门梁）。光禄塞位于大青山、乌拉山分界的峡谷之中，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宣帝将呼韩邪安置于此，显示出对他的信任和重视。为救济呼韩邪部众，宣帝又命令提供粮食物资。

元帝即位后，也不断为呼韩邪提供粮食物资，纾解呼韩邪的经济困境。此后，两汉、南匈奴及此后归附的北匈奴，长期共同驻扎于长城边疆。匈奴不仅接受汉朝的物资援助，而且通过提供马匹、牛羊，与汉朝民众开展民间交流，史称“通关市”，也即在长城关口之处，开展互市。

东汉时期，民族整合进一步加强。安帝末年，“胡降二十万口”。许多部族加入到汉军之中，比如东汉末年董卓率领的并州军队中，便有大量“胡兵”。汉代的匈奴贵族通过“和亲”，与汉朝皇室保持了血缘关系，通过拟制血亲的方式，改为刘姓。比如汉赵政权的建立者刘渊，便是匈奴单于之后。他在西晋末年动荡局势下，以刘氏外甥自居，重建“汉”朝。

唐太宗贞观三年，突厥等部族向唐朝归降。唐朝仿照两汉在长城边缘安置匈奴降众的做法，将突厥转化为长城守卫者。

明朝与建州女真，同样长期维持了大体相似的关系。建州女真作为明朝的羁縻卫所，地处辽东长城边疆外缘，一方面负责为明朝看守长城，另一方面由此而长期获得明朝的物资供应。伴随北疆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的持续推进，来自不同地区的文化脉络，在这里汇流入海、交相辉映，从而开始初步形成多元的“北疆文化”。

融通“北疆文化”的文明塑造

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所创造一切物质的综合，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伴随北疆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多元“北疆文化”开始初步汇合。但构建具有明确内涵、具有独特性质、焕发特殊光彩的区域文化，仍然有待于本地社会的持续建设，才能真正由此而塑造出坚实的文化形态。而在这一方面，长城边疆仍然发挥了脉动作用。

众所周知，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占据着绝对的战术优势。有鉴于马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历代政权都将马匹数量的多少，作为衡量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长城边疆地域广阔，可以采取游牧的方式散养马匹，马匹体格较为健壮，战斗力较强。为培育骑兵，两汉、隋唐、明朝都在河南地（今内蒙古鄂尔多斯）、漠南草原放牧战马、培育骑兵，从而与北族政权一起锻造

出中国古代十分浑厚的骑战军事文化，为古代中国持续开拓边疆、维护国家统一，提供了军事支撑。

在长城边疆，中原王朝不断推广农业屯垦，将蒙古草原从单一的游牧经济转变为农牧复合经济，甚至农工复合经济。西汉武帝收复河南地、打通河西走廊之后，便在河南地及其西北直到令居（今甘肃永登）推广农业经济。明中后期，大量汉人向北越过长城，进入蒙古高原，建设出大片定居农业聚落，称为“板升”，也就是汉语中的城市、房屋之意。“板升”聚落规模很大。“有众十余万，南至边墙，北至青山，东至威宁海，西至黄河岸，南北四百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无山峻溪河之险。”不仅有农民，还有手工业者，“中国百工技艺无所不有”，从而将蒙古高原的游牧经济方式一改为农工牧结合的复合经济，推动了明清时期蒙古高原的经济转型。

伴随长城的渐次修筑，中原王朝逐渐开辟通往蒙古高原的交通道路，从而增强对长城边疆的支持力度，加强南北沟通与交流。最早开辟这类交通道路者是秦朝，秦始皇修建了从云阳（今西安淳化）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的宽阔直道。此后历代中原王朝、北族政权，不断在蒙古高原开展交通建设。蒙元时期尤其建立起来了普遍而发达的站赤制度。

在各方面条件逐步具备的情况下，中原王朝努力加强在蒙古高原的政治建设。东汉和帝时期，大将军窦宪仿照管理南匈奴的制度形式，在漠北也设立领护。唐朝在蒙古高原设立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尽力加强统治。清朝在蒙古高原实行盟旗制度，堪称北疆管理的划时代进步，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疆域完整。

伴随历代政权在蒙古高原全面开展经营，北疆地区逐渐从偏居一隅的边缘区域，开始成长、转变为拥有庞大人口规模、雄厚经济基础、强大军事力量的重点区域。在此基础上，北方边疆借助自身位于中原王朝和周边政权中间枢纽的角色，努力推动陆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的全面开辟与发展。“北疆文化”由此不仅逐渐塑造出坚实的文化形态，而且不断吸收来自异域的文化元素。伴随历史的演进，多元融通的“北疆文化”逐渐发展成熟。

长城作为古代世界修筑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工程，对南北中国都持续发挥着脉动作用，不仅吸收南北地区人口、资源不断进入，而且推动不同民族之间的全面整合与北疆地区的全面建设。在此基础上，北方边疆吸收了来自不同区域、乃至异域地区的文化元素，通过自身的不断建设，逐渐塑造出坚实的文化形态，形成了以多元融通为特征的“北疆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高质量推进“北疆文化”建设

◎纳日碧力戈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我们要坚持大历史观，把握好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把握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理论导向、实践逻辑与具体路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中蕴藏着祖先留下的智慧和哲理，有值得后人守护好、发展好的文脉和根脉。大历史观是长时段的大历史观，涉及经济、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等方面，要一以贯之、全面融通；大历史观是胸怀世界的大历史观，要立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历史观是探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大历史观，要层层递进、逐次提升，不局限于一国一族、一时一事；大历史观是辩证统一、贯通古今中外的大历史观，不可挂一漏万、专注一面而忽视其余。换一个角度看，大历史观与大文化观高度融合，历史中有文化，文化中有历史。打造“北疆文化”离不开大历史观和大文化观，要服务于整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新发展，更要服务于全面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取得的宝贵成果。

今年7月5日，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决定》，重点突出“七个作模范”：在感党恩听党话、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奋进新征程上作模范，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作模范，在民族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作模范，在边疆民族地区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作模范，在兴边稳边固边上作模范，在边疆地区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上作模范，在弘扬新风正气上作模范。突出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强调要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挖掘和展现内蒙古的历史文化和人文资源，将红色文化和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融为一体，打造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守望相助、共同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本内容的“北疆文化”品牌，强调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安全、边疆安全多作贡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历史观的主脉，“北疆文化”是支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离不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灿烂辉煌。“北疆文化”建设要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相结合，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同步。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办好两件大事为发力点，努力完成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发扬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和各族人民识大体、顾大局、讲风格、求奉献、有担当的宝贵品质，做全方位、各方面经得起考验的模范。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要做到文化兴、文化强，就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质量推进“北疆文化”建设，各族人民要加强团结，推动内蒙古独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品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守护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守护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两个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交融创新发展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生生不息，在于日日新。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创新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两个结合”是对于马克思“东方社会”之问、“卡夫丁峡谷”之间的最好回答。中国不必补西方资本主义之课，而是要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以中国式现代化经验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让人类社会发展多一种选择、多一种发展机会。

“北疆文化”建设需要全面准确完整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任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就是守正创新，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过时的，以高度智慧执两用中、兼和相济。“北疆文化”建设要坚持“民族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相结合的传统，处理好“形气神”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以“形多”促“神一”，重在意识、认同，不在繁多、形色。

“北疆文化”建设要突出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要突出党领导下的模范自治区的模范文化，充分肯定各族人民的革命贡献，突出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内蒙古各族人民对“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认知最明、体会最深，中国共产党与内蒙古各族人民生死与共、命运与共。

“北疆文化”建设要和内蒙古红色文化建设同步，把红色文化与“北疆文化”浇筑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突出革命英烈的事迹和形象，使之融入社会记忆，让红色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民心相通是最大的政治。“北疆文化”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要鼓舞各族人民以高度的责任感、强大的意志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共同团结奋斗。我们要建设团结奋进的“北疆文化”、守正创新的“北疆文化”和模范自治区的“北疆文化”。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自治区党委提出打造“北疆文化”品牌，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生动实践，是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重要抓手，是抓好文化建设、增进文化认同，提升内蒙古正面形象的有力支撑。

“北疆文化”蕴含生态的艺术，突出了中国特色。“北疆文化”是涵盖内蒙古地区所有文化、体现内蒙古特质的全新概念，是推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北疆文化”中蕴含的生态理念，是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共同追求。内蒙古地域文化的形成，本身就是一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比如科尔沁民歌与布里亚特民歌、阿拉善民歌、锡林郭勒民歌的同宗民歌曲调部落、跨地区的流传和演变；比如二人台艺术的发展、漫瀚调音乐的形成就是由山西、陕西、河北人民“走西口”带到内蒙古，和当地的文化、曲艺融合形成的艺术形式，这都是多民族、大融合的特点在“北疆文化”中的鲜活体现。听内蒙古民歌、看内蒙古舞蹈、读内蒙古故事时，都能从中找到各族人民对绿色草原、游牧生活、高山流水、树木森林的赞美，都能感受到内蒙古人民崇尚自然、尊重生态、和谐共生的地域特征。近几年，内蒙古艺术团民族乐团创作“北疆”三部曲，先后推出了《北疆赞歌》《北疆天籁》两部民族管弦乐作品，还将推出第三部作品《北疆畅想》，与打造“北疆文化”品牌要求契合。内蒙古艺术团将继续挖掘“北疆文化”中的生态主题，延伸其在艺术范畴中的深刻内涵，打造更多代表内蒙古形象的艺术作品。

“北疆文化”蕴含生命的艺术，体现了中国风格。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造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决定了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多年延绵不断、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内蒙古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民族地区的体现，更是各民族地区文化现代化成果集成的过程，具有突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以黄河流域为主的中原文化和以北方草原为主的草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其中一支，是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共同创造并传承发展至今的奋斗成果。今年，我们围绕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创作了歌舞剧《昭君出塞》和歌剧《江格尔》，用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故事，深植历史文化，用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投射时代风貌，以鲜明独特的符号形象，塑造“北疆文化”品牌的精神内涵象征，与人们产生紧密的情感连接和文化认同。

“北疆文化”蕴含生活的艺术，展现了中国气派。“北疆文化”基本内容中包含的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激发我们永葆自豪感、责任感、自信心的重要源泉。比如，内蒙古民歌赞颂亲情、爱情、友情，表现了对生活的热爱；赞扬英雄、家园、骏马，体现了对精神力量和正面形象的追求。“北疆文化”包含的诸多元素，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实生活内容、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北疆文化”不仅反映各族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内蒙古的文学、艺术、饮食、人文、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有体现。科尔沁民歌《张玉玺》、舞蹈《挤奶员》、舞剧《骑兵》、杂技剧《我们的美好生活》等作品，都体现了“北疆文化”所蕴含的是生活的艺术，展现的是内蒙古人民扎根生活、守正创新的干劲、拼劲、韧劲，代表了内蒙古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展现了胸怀天下的中国气派。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内蒙古艺术剧院党委书记、院长）

打造更多代表内蒙古形象的艺术作品

◎李莉